

筆會

文丛

10

史与诗

萧关鸿

学林出版社

革命

文丛

10

史与诗

萧关鸿

学林出版社

目 录

自序

第一辑 问 史

- 5 历史的难题
- 13 造反及其他
- 20 绝对权力的一次演习
- 23 历史转折点的记录
- 26 讲真话的力量
- 29 一代人的失落
- 33 没有答案的困惑
- 38 原始记录的价值
- 42 历史的沉思
- 45 永远不应当忘记
- 47 六十年风水
- 50 商务百年
- 54 最后一位托派

第二辑 说书

- 61 现代传记的开山之作
- 63 西学东渐第一人

-
- 65 从旧式女子到革命杰士
67 上海闻人李平书
69 中华帝国的最后一根辫子
72 迟到的理解
75 盖棺未能论定
78 第一部公开的日记体自传
80 胡适对传记文学的贡献
82 读圣贤书, 所学何事
85 从社会底层走出来的作家
87 一个女兵的自传
90 孤独者最大的精神财富是回忆
92 最后的是坦白的话
94 石破天惊的古史辨
97 在监狱中完成的自传
99 前半生与后半生
102 义丐武训传
104 时非可死之时, 年非应死之年
106 风华从朴素中来
108 毕生献给传记文学的第一人
111 独立的学者与悲剧的牺牲者
114 充满乡土气味的自传
117 一生总算没有白过
120 能否跳出这个周期率
123 生亦其时, 死亦其时
126 人死声销迹灭最是理想
129 不多取一分不属于自己的东西
131 有点像自传、有点像回忆录、有点像近代史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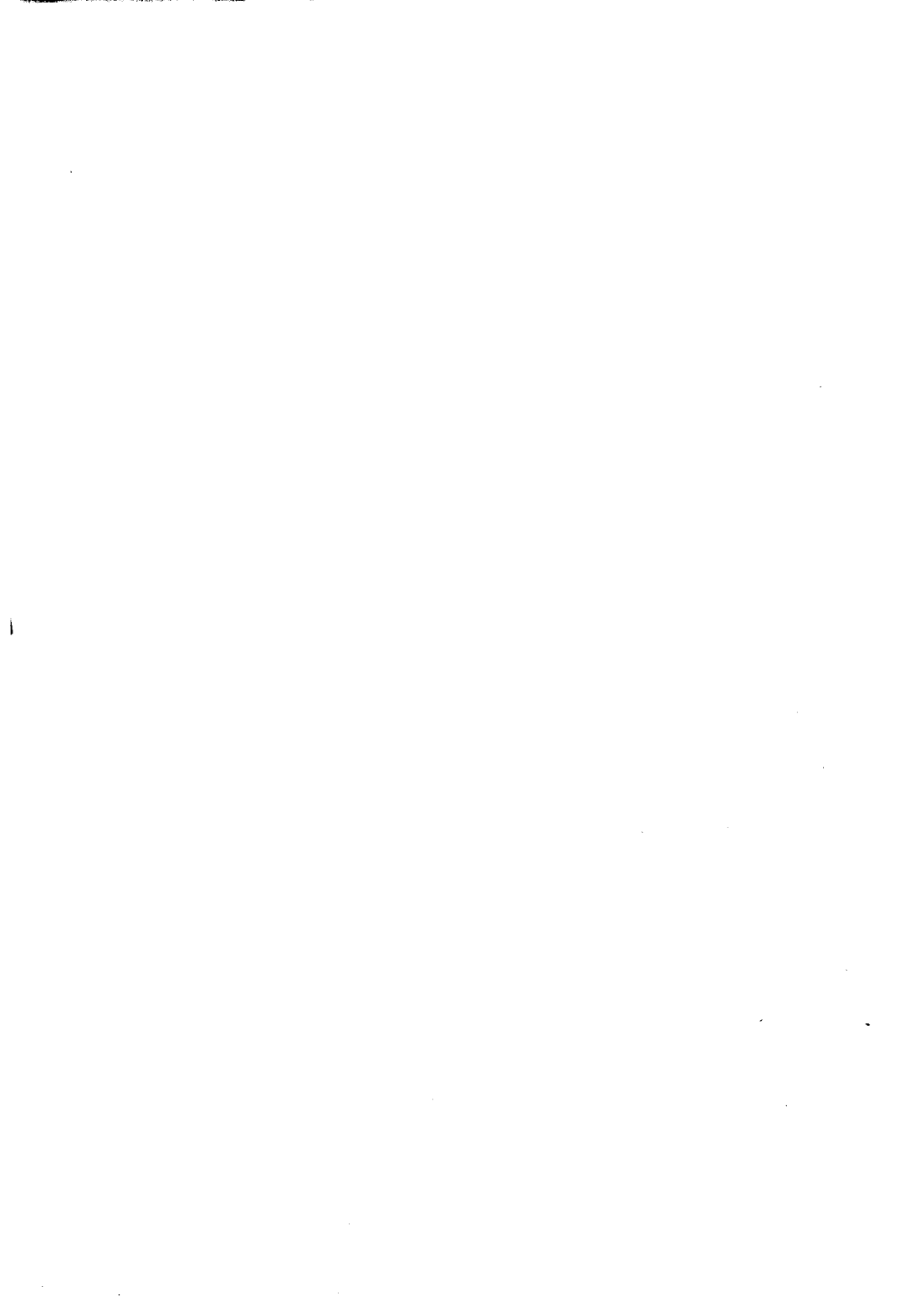
- 134 对外国人讲中国文化、对中国人讲外国文化
137 七房桥的世界
140 汉语言学之父
142 口述历史的历史
144 大师的悲剧性
147 留下历史的真实
150 我这一生都像是在“否定”里生活
154 看张
157 最后的苏青
163 一个人与一段历史
187 世纪末的回顾
189 传统与个性
192 副刊与文学

第三辑 论艺

- 199 刘海粟与徐悲鸿
205 四十而不惑
208 永远的诱惑
214 创作力断想
227 寻找调子
234 沉淀的激情
241 变化中的风格
249 文学的十字架
259 落选者沙龙

第一輯 問 史





历史的难题

歌德老人说过：“撰写历史是摆脱过去的一种方式。”

我们每个人都对过去负有责任，而不能把过去的灾难仅仅作为恶梦一笔勾销，或者把它归结为少数人的阴谋权术。

德国海德堡大学哲学教授雅斯贝尔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那一年就写出《德国人的罪责问题》一书，代表德国民族作出忏悔和反思。他思考的是每一个普通的德国人都必须回答的问题。

当我们回顾往事时，我们自己的经历和我们看到的一切还历历在目。因此，我们首先关注的是作为群众运动形态出现的“文化大革命”。

群众运动并不等于革命运动。只要有大量群众参加，持续一定时间，造成相当影响的群众活动都应当承认是群众运动。而群众运动可以是推动历史前进的革命，也可以是逆历史潮流的反动，最著名的反面例子是法西斯主义的群众运动。

一个国家在某个时期产生某种类型的群众运动，是由

各种历史和现实的因素决定的,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甚至不以群众运动的发动者和领导者的意志为转移,我们过去的研究只看到群众运动的革命性而忽视了它的破坏性,只看到群众运动的正面而忽视了它的负面。

毛泽东与历史上任何一位领袖的不同之处,在于他掌握政权之后仍然接连不断地发动群众运动,从“三反”、“五反”到“反右”,从“大跃进”到“四清”,他都认为还没有充分发动群众,直到最后他终于找到“文化大革命”这个形式,实现了他的宿愿。

“文化大革命”中的群众运动,既是被毛泽东和中央“文革”派所“运动”的不自觉的群众,又是群众按照自己的理解和需要进行的自觉的运动;既有群众对伟大领袖的崇拜和信赖,又有对自己利益的下意识的追求。因此,“文化大革命”的进程既是有序的,又是无序的。当它体现毛泽东的意志和成为中央“文革”派的政治工具时,它是有序的;当它表达和宣泄本身原始的动机和欲望时,又是无序的。所以,这场大运动呈现了瞬息万变而又无限丰富的景象,也留下了永远使人困扰和捉摸不透的疑团。

二

第 一 章
问 题
海 内 外 研 究 者 最 感 兴 趣 的 群 众 组 织 是 红 卫 兵, 把 红 卫 兵 作 为 中 国 “ 文 化 大 革 命 ” 的 象 征, 而 忽 视 了 或 者 完 全 没 有 认 识 到 工 人 造 反 派 在 “ 文 化 大 革 命 ” 中 的 地 位 和 作 用, 这 不 能 不 说 是 研 究 工 作 中 极 大 的 缺 憾。 其 实, 工 人 造 反 派 是 比 红 卫 兵 更 重 要 更 典 型 的 代 表。

史 红 卫 兵 是 第 一 个 登 上 “ 文 化 大 革 命 ” 舞 台 的 群 众 组 织,

它表现出年轻人疯狂的热情和理想的追求,体现了“文化大革命”乌托邦式的理想。工人造反派却把人们从理想的梦境拉回现实的泥潭。“文化大革命”很快便失去了浪漫色彩,显露出血与火的本质。

红卫兵运动的黄金时代只有几个月。这段乌托邦理想的蜜月随即变成痛苦的回忆。到1967年初的权力再分配中,工人造反派已独占鳌头,红卫兵则成了可怜的点缀。一年以后,随着“工宣队”进驻大中学校,红卫兵运动便成强弩之末。有意思的是,工人造反派是在红卫兵榜样的鼓舞下产生的,最后却由工人造反派来结束红卫兵运动。

如果说,全国红卫兵组织中最典型最具代表性的是北京红卫兵,那么全国工人造反派组织中最典型最具代表性的是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即工总司。

红卫兵与工人造反派相比,不仅存在时间短,而且它们对社会生活的冲击和破坏也相对表层化,虽然轰轰烈烈,但如水过地皮湿,并没有真正触动社会的结构和基础。工人造反派一旦行动起来,就会牵动全局,影响整个社会。工总司在它成立的第二天就卧铁轨拦火车,造成半个中国铁路运输瘫痪。这是全国性动乱的真正开端。“文化大革命”中最活跃的力量是学生、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没有主动参与过运动,“文化大革命”对农村几乎没有触动。“文化大革命”的舞台在城市。学生和知识分子在骚动了一阵之后即被作为“接受再教育”的对象赶下舞台,只剩下工人造反派唱独角戏。他们以“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名义进驻上层建筑,控制了全部权力。在“文化大革命”全过程中,各个阶层,各种政治势力都被轮番整了一遍,而工人造反派是整人的打手和唯一的既得利益者。

并不是各地的工人造反派组织都有这种幸运。上海工总司是“文化大革命”的宠儿。工总司的特殊地位凭借了它与中央“文革”派的特殊关系。在中央决策层活动的几个极左派与成为他们社会基础的群众组织直接勾结起来，这种情况是1949年以后的中国政治生活中从未出现过的。他们的勾结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领导和群众的结合，而是结成一个政治帮派。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在“文化大革命”准备时期已经勾结起来，但只有在王洪文加入之后这个帮派才真正形成。王洪文这个角色是不可轻视的，也是其他人无法替代的。这个帮派的形成使工总司不再等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群众组织，使工总司的政治能量为其他群众组织无法比拟。所以，全国造反派唯上海工总司马首是瞻就毫不奇怪了。

三

工人造反派成为“文化大革命”的代表并非偶然，因为“文化大革命”中的一切都是以无产阶级的名义进行的。

和中国任何一次社会大变动一样，知识分子总是敏感的先知先觉者。“文化大革命”发动时期的主角是极左派知识分子和以红卫兵面目出现的小知识分子。但知识分子从来没有构成一场运动的主体。当上海工人造反派在安亭车站崭露头角之后，立即引起毛泽东极大的关注，因为它符合毛泽东头脑中的构想。

毛泽东从韶山冲走出来，与中国农民血肉相联，他打天下率领的也是一支农民的队伍，但他始终认为自己代表无产阶级，并且对于中国工人阶级始终寄予极大的期望。因

此，当他发现上海工人中有那么一些他所期望的大闹天宫的孙悟空时，他在感情上和理性上的欣喜是不言而喻的。他与王洪文的私下谈话中几乎肯定了工总司造反初期的一切越轨行为，他公开以党中央的名义发表贺电支持工总司是“文化大革命”中唯一的例外，他派工宣队进驻上层建筑更给了工人造反派“领导一切”的权力。他希望工人真正成为“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使“文化大革命”真正赋有无产阶级的性质。

任何真正意义的社会变革必然有一个作为推动者的社会中坚力量。毛泽东理所当然地把这个重任寄托于工人阶级。但是，毛泽东显然不了解社会主义时期的工人阶级及其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变化。当工人中追随共产党几十年的先进分子被作为“保守派”排除在“文化大革命”之外时，工人中的落后分子和受压制者却成为毛泽东赞赏的造反派。这些工人造反派并不具备现代无产阶级的觉悟和素质，许多人沾染着流氓无产者的习性。他们只是一股破坏性的力量。当要冲决旧体制的罗网时，这股力量的破坏性是可以利用的，但一场真正的革命运动应当及时地淘汰他们，而毛泽东则把他们当作工人阶级新生力量的代表。

毛泽东这个战略上的失误与他理论上的失误是联系在一起的。毛泽东所理解的社会主义时期的先进阶级只是工厂里的体力劳动者，而脑力劳动者，即知识分子是需要批判和改造的对象，不属于先进阶级。从这个理论失误出发引出的必然结论是应当由工人阶级来占领上层建筑，改造知识分子，即由工人阶级中的一部分去反对另一部分，由工人阶级中没文化的人去领导有文化的人，文化落后的人去改造文化先进的人。当世界已经进入科学技术成为最伟大的

生产力的时代,这样的占领不能不是一种破坏和倒退。

毛泽东的理论失误给他自己提出了一个无法解决的历史难题。

四

工人造反派的必然失败还有更深层的原因。

当工人造反派刚从安亭崛起时,大多数人对他们抱有成见,还难以预料他们会干出什么事业来。当他们横冲直撞,大刀阔斧地突破现行的政治规范、思想规范和道德规范并得到毛泽东的首肯时,人们不得不对他们刮目相看了。

大多数人曾经虔诚地相信这是一场翻天覆地的大革命。人们以为将要看到一个崭新的体制、崭新的秩序和崭新的价值观念体系,也即工人造反派和红卫兵宣称的“红彤彤的新世界”。人们耐心地等待奇迹的出现。但是,奇迹只存在于宗教式的梦幻之中。

原有的体制被打破了,新的体制却没有建立起来。毛泽东声称破字当头,立在其中。其实,破与立是两个过程。当这两个过程完全脱节时社会必定陷入大混乱。

工人造反派是具有破坏力和爆发力的社会力量,他们在冲决罗网时可以叱咤风云,但他们却没有创造和建设的能力,即使在他们能够有所建树的经济领域里也无所作为,他们只是重复一些现成的流行的口号。他们批判“管卡压”反对大工业的科学管理,批判“利润挂帅”反对基本的经济规律,批判“物质刺激”反对个人物质利益原则,批判“洋奴哲学”反对开放国门。这些口号实际上反映了小生产者的平均主义要求和反现代化的封闭意识。这是工人造反派最

本质的思想特征。

工人造反派这种反现代化的思想特征是在毛泽东《五·七指示》勾勒的那种自给自足、平均主义、小而全、封闭式农业社会主义理想中孵化出来的，打着坚持社会主义的旗号在当时有极大的迷惑性。

但是，近百年来先进的中国人把实现现代化作为伟大的奋斗目标，这是不可遏制的历史要求和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任何反现代化的努力不管打着什么旗号，归根到底要被历史和人民所抛弃，也会遭到经济规律的惩罚，中国经济在1976年到了崩溃的边缘不是偶然的。这是工人造反派最终垮台的最深刻的原因。

上海工人造反派崛起时只有几千人，在工厂里是绝对少数派，但他们代表了“文化大革命”的方向，在当时颇有纵横捭阖，所向披靡的气势。在短短几个月里，他们迅速发展成为多数派。

“文化大革命”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标志，不是夺权，而是它赢得了群众的大多数，这使它成为波澜壮阔的群众运动。

有些研究者无视或者否认多数这个痛苦的事实，但历史真实不是任人涂抹的。

自然，形成这个多数有着极其复杂的原因。但正是这个多数无情地揭示了许多发人深省的问题。

作为胜利者，工人造反派没有能够保持这个多数。他们被自己夺到的权力所腐蚀，迅速暴露出他们本来掩盖着的种种致命的弱点和不可克服的矛盾。

“文化大革命”从亿万人参与的群众运动逐渐蜕变为少数人的权力斗争，暴露了它的本质还是少数人的政治。

因此，那些曾经与人民群众休戚相关的斗争逐渐使人

们感到淡漠疏远。那些越来越频繁的斗争甚至脱离了他们最基本的造反派群众，与他们利益相关的只是少数造反派头头。

这个蜕变过程决定了工人造反派必然失败的命运。

五

工人造反派尽管一再标榜自己是巴黎公社事业的继承者，尽管一再声称奉行巴黎公社民主选举原则，但他们只是借用前人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偷运自己的私货。他们从来没有真正实行过民主选举，它的组织形式更接近于旧中国工人中的帮会，领导权始终控制在先进山门的少数头头手中。我们用尽量冷静和客观的态度去描述他们的行为，但还是难免使人感到他们的夸张和荒诞。这是极左派把一切事物都推向极端的必然结果。极左和极右都不符合人的本性。违反人的本性只能把真实扭曲为虚假，虚假是那个时代的最大特征。因此荒诞成了工人造反派的真实面目。

今天的人们会觉得他们可笑，但他们在那个年代一点也不可笑，因为整个社会生活都是可笑的。

作为个人，他们是荒诞的。但作为一个群体，他们的存在并不荒诞。

就如马克思分析路易·波拿巴雾月政变一样，我们看到使工人造反派这些可笑的人物扮演了叱咤风云的角色的社会原因是严肃的。因此，我们更多关注的不是他们作为个体而是作为群体存在的工人造反派的命运。

史

12